

清华大学建筑学术丛书

梁思成学术思想研究  
论文集

1946—1996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5 号

本书汇集了有关梁思成学术思想研究的部分论文。过去建筑界对梁思成的了解偏重于他 50 年代的建筑思想。本书从时间跨度和学术领域两个方面为读者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内容涉及 20 年代末以来梁思成的传统建筑理论、城市规划思想、古城保护和文物建筑保护理论、建筑设计思想、中国雕塑史研究、建筑教育思想等多个领域。书中提供了梁思成本人的部分建筑作品以及不少鲜为人知的史料,客观地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对梁思成的学术思想进行整理、分析及评价,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清华大学建筑学术丛书

(1946—1996)

**梁思成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

高亦兰 编

中国建筑工程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建筑工程出版社印刷厂印刷(北京阜外南礼士路)

开本:880×1230毫米 1/16 印张:8<sup>1</sup>/<sub>2</sub> 字数:253千字

1996年9月第一版 1996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600册 定价:32.50元

ISBN 7-112-02862-0

TU·2182 (7975)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 前言

本书是为纪念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系)成立 50 周年而出版的建筑学术丛书的一个分册。这是国内第一本比较集中而又全面反映梁思成学术思想研究的论文集。

梁思成先生是我国建筑界的一代宗师,又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创办人。他在建筑学的各个领域,特别是古建筑研究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吴良镛教授曾说“梁思成先生作为我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的功绩,从来得到海内外的敬重。但是……梁先生的业绩是多方面的……也许我们还未必一一注意到。”因此全面研究梁思成的学术思想,是我们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本书正好适应这一需要。

海内外一直有不少专家进行着梁思成学术思想研究。我系的建筑历史教研组,这个梁思成先生原来所领导的研究集体,不仅继续着梁思成先生的研究工作,而且对梁思成的古建筑理论、古建保护理论进行着不懈的研究;吴良镛教授曾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多次发表过论文,阐述梁思成的学术思想;建设部、一些高等建筑院校、部分大城市的规划机构和设计院,都有专家教授进行梁思成学术思想研究;我本人萌发要研究梁思成建筑思想的念头始于 1984 年。当时我听了吴良镛教授给系里教师作的一个学术报告,他号召大家“学习梁思成的建筑思想,使建筑教育更上一个台阶”,我考虑到:一来我系建筑历史教研组有关梁思成研究的内容主要偏于古建筑方面,其他方面涉及较少;二来我本人是建国初期入学的,曾有机会亲聆过梁思成先生的教导,这也是进行研究的好条件,因而我们于 1985 年初成立了梁思成研究小组,对梁思成先生的城市规划、古城保护、建筑设计及教育思想进行研究。此外,在台湾、香港、英国、美国等地也都有学者进行梁思成研究。

此次能有机会出版这本书,将梁思成学术思想研究方面的成果汇集起来,确是一件大好事。希望今后有更多的同行参加此项研究。书中约半数论文是过去发表过的,其余是首次发表。论文作者们都是工作繁忙的专家学者,但是都十分重视本书的出版。他们克服了各种困难,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我向他们致敬。

高亦兰

1996 年 6 月

# 目 录

## 前言

|     |                                   |         |
|-----|-----------------------------------|---------|
| 1   | 继承和发扬梁思成学术和教育思想 .....             | 吴良镛     |
| 5   | 《梁思成文集》序 .....                    | 吴良镛 刘小石 |
| 9   | 不能忘却的纪念 .....                     | 周干峙     |
| 12  | 一代宗师 垂范后学                         |         |
|     | ——学习梁思成先生文集四卷的体会 .....            | 傅熹年     |
| 15  | 我国文物建筑和历史地段保护的先驱 .....            | 陈志华     |
| 21  | 巨匠的足迹                             |         |
|     | ——梁思成“中国古代建筑历史和文物建筑保护研究”侧记 .....  | 徐伯安     |
| 24  | 历史城市的保护和现代化发展的杰作                  |         |
|     | ——重读梁思成先生论城市规划的著作 .....           | 刘小石     |
| 34  | 梁思成的古城保护及城市规划思想研究 .....           | 高亦兰 王蒙徽 |
| 70  | 梁思成的规划思想与西安古城保护 .....             | 韩 骥     |
| 74  | 学习梁思成先生《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一文 .....        | 陈明达     |
| 77  | 梁思成先生与建筑设计 .....                  | 关肇邨     |
| 81  | 探索中国的新建筑                          |         |
|     | ——梁思成早期建筑思想和作品研究引发的思考 .....       | 高亦兰     |
| 87  | 梁思成建筑创作思想学习笔记 .....               | 张锦秋     |
| 96  | 心灵的丰碑                             |         |
|     | ——从梁思成先生的手稿《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经过》谈起 ..... | 郑光中     |
| 100 | 梁思成和北京仁立公司铺面改造 .....              | 林 洙     |
| 106 | 建筑意象与建筑意境                         |         |
|     | ——对梁思成、林徽因先生“建筑意”概念的阐释 .....      | 侯幼彬     |
| 111 | 梁思成早期建筑思想初探 .....                 | 高亦兰     |
| 117 | 严谨 守拙 简练                          |         |
|     | ——有感于梁思成先生的建筑画 .....              | 吴良镛     |
| 118 | 读梁先生著《中国雕塑史》 .....                | 曹 汛     |
| 122 | 梁思成理工与人文结合的教育思想 .....             | 羊 焯     |
| 126 | 梁思成建筑教育思想的形成及特色 .....             | 赖德霖     |

# 继承和发扬梁思成学术和教育思想

吴良镛

从梁思成先生的著作中，从我们大家对他的事业的追忆中，我们不仅看到这位杰出学者在学术上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看到他为我国建筑事业所留下的珍贵文献和宝贵财富，也使我们对他的敬重与怀念之情更为深沉更为强烈了。

今天，我们在这里不能全面来介绍和评价梁先生的一生，但有两个方面需要特别提出：

## 第一，我们对梁先生的学术和事业成就，需要作为整体来认识。

梁思成先生作为我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的功绩，从来得到海内外的敬重。但是，梁先生的活动和事业是随时代而前进、而发展的，他的业绩是多方面的：他是中国近代建筑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他是中国古建筑文物、历史名城保护工作的倡导者；他是首都城市规划工作的推动者和几项重大设计方案的主持者；他还是我国建筑学术组织的发起者……。关于这些方面，也许我们还未必一一注意到。海峡对岸的台湾建筑同行，近年来重新印行《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并著文高度评价梁先生在古建筑工作的造诣，文章引证殷实，见解精辟。可惜他们对梁先生在解放后的贡献，了解不够，研究与评价未必全面。近年来，随着祖国城乡建设事业的推进，学术活动的开展，文物保护工作的进展，建筑创作的繁荣与创作问题的探索，人们更不时地回忆起梁思成先生来。现在《梁思成文集》第四卷（梁先生解放后部分文章的专集）已经出版。它是解放后梁先生对新中国建筑事业卓越贡献的证明。假如梁先生不受病魔的折磨，没有“文革”的灾难，能够迟走十年，那么，在像今天这样宽松的环境中，他的学识和才能，一定会得到更大

的发挥。每思及此，倍加惋惜。

## 第二，对梁先生未竟之业，需要继续发扬。

梁先生，一代宗师。他是各项事业的先驱者。他一生的探索，在荆棘丛生中开路的工作，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但是，对照我们当前的工作和今后的任务，还只是一个开端。无论学术和事业，均有赖于我们的继承和发扬，需要我们做的、和我们可以做的工作还很多。概括地说，就是开展和进行“梁思成研究”的工作。这里我想就此提出两个方面的问题谨供参考。

### 一、研究和发展梁思成的建筑人文思想

《梁思成文集》中有不少笔墨专门论述什么是建筑学这个问题。作为中国近代建筑的开拓者与启蒙者，这是个无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很根本的问题。时至今日，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仍然有现实意义。

梁思成的建筑思想，是不断随时代前进而发展的。具体来说，似可从下列几个方面来加以分析和认识。

#### ——建筑的社会观

梁先生早期论建筑，即常以建筑的“住”的功能为开端。他说，“居室为人类生活中最基本需要之一”，“居室与民生息息相关，小之影响个人身心之健康，大之关系作业之效率，社会之安宁与安全”。“营国筑室古代尚设专官，使民安居然后可以乐业”。“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人类之于‘住’的要求的确是提高了，而且复杂了”。作为一位建筑学家，梁先生的建筑思想也是随时代而推进的，逐渐地把自己的视野从单一的建筑，转向了城市。在抗日战争前夕，梁先生已认识到

“整个城市将成为一个有组织之 working mechanism”。梁先生很欣赏《城市即人民》(Henry S. Churchill:《THE CITY IS THE PEOPLE》, 1945 年版, 无中译文)一书。抗战胜利后, 他与林徽因先生以憧憬未来的心情, 重视西方国家战后住宅研究, 他并大声疾呼“住者有其房”、“一人一床”的社会理想。随着祖国的解放, 他与林先生虽都已抱病, 但仍以极为兴奋的心情, 随同薛子正秘书长视察北京市第一批市民住宅的建设。建筑为社会服务, 是这位正直的学者学术理论的基本立足点。

#### ——建筑的环境观

环境的概念, 是梁先生在 1947 年夏从美国讲学归来最早介绍给中国的。梁先生指出“一座房子既然盖起来, 就是一个有体有形的东西”。他因之将 physical environment 译之为“体形环境”, 以后他多次发挥这一论点, 认为“一个建筑师要全面地、综合地研究一座建筑物各方面的需要, 和他的自然环境及社会环境(在城市什么地区, 左邻右舍是什么房屋)……而予以合理安排”。在梁思成关于中南海新建宿舍及长安街规划问题的论述中, 对建筑环境之整体性的探求, 都说明他的犀利的眼光与卓越的见解。当然, 梁先生对体形环境的见解还是偏多在美学方面, 对比现代“环境设计”的概念, 还有所欠缺, 但是明确地强调建筑的环境观, 构成他建筑思想的整体, 已是难能可贵的了。

#### ——建筑的文化观

作为建筑史学家的梁思成, 他是把中国建筑体系作为世界各民族数千年文化史中一个独特的建筑体系来认识的。他说“建筑是人类征服自然, 改造自然斗争的纪录; 建筑又是一种艺术创造, 反映着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经济状况; 不同民族的衣食、器物、居室都有不同(民族)性格或(民族)特征; 建筑是人类一切造型创造中最庞大、最复杂的。所以它所代表的民族思想和艺术, 更显著更强烈, 也更重要, 建筑上可以反映建造它的时代和地方的多方面的生活状况”……凡此种种足以说明建筑是各民族文化的一种重要代表。

基于此, 他把建筑活动既看作是经济建设, 也是文化建设。他坚信, “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 必将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1955 年, 他反省了对经济建设的认识不足之处, 但有鉴于一般

人对建筑文化的忽视, 他在各种场合下更加强调建筑的文化性。也正因为如此, 他特别强调像北京这样珍贵的古建筑文化环境的保护等等。在社会活动中, 他力争建筑师参加文联, 认为这不是个人席位的问题, 而表明建筑在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因而当仁不让。

#### ——建筑的创作观

梁先生基于以上的认识, 形成了自己的建筑创作观。同时, 他的认识和观点, 也有所发展、曲折和变化。他的见解: “建筑是全面反映社会面貌和有教育意义的艺术”, “建筑是有民族性的”, “中国建筑有悠久的传统和独特的作法 and 风格”……他要求在新时代的建筑创作中要反映民族和地方的特点。

作为梁思成先生建筑创作观最后的和最集中的代表是“新而中”设计思想, 这是在 1958 年讨论人大大会堂方案时提出的, 当时是与“中而古, 西而新, 西而古”相比较而言的。后来梁先生又对此作了种种解释, 如“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新风格”、人民性、科学性等, 但是“新而中”的思想命题是清晰明确的。

梁先生的建筑思想中其他如建筑的艺术观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将上述梁先生的种种理论和认识汇为整体, 可以称之为“梁思成建筑人文观”。上述建筑理论本身未必十全十美, 但只要回忆所处的时代, 对比所谓“新技术”时代的国际式建筑等等思潮, 可以发现后者的立论之不足。再看今天, 中央宣布, 在全国一致致力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 重新认识建筑与城市的文化作用、建筑的继承与革新、以及保护历史名城与建筑风貌的历史意义, 并且对证当今一些新建筑学派对建筑的人文方面与地方特性探求, 以及亚洲建筑师对探讨亚洲特性之种种呼吁等等, 再来审视梁先生 20 几年或几十年前的一些建筑见解, 却又显得较为完整而难能可贵了。

#### 二、继承和发扬梁思成的建筑教育思想

作为中国近代建筑奠基人之一的梁思成, 十分重视建筑人才的培养, 他的有关建筑教育的论述与文献, 可惜在过去历次“大批判”中, 多已散失, 现在只能在新发现的一些佚文中, 如 1945 年 3 月为发展战后建筑教育致当时清华校长梅贻琦的信, 以及 1948 年清华建筑系教学改革代拟致当时教育部的文稿等等, 我

们温故而知新，聊以窥见一斑。

——建筑事业的发展须寄期望于人才培养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1945年初，梁先生鉴于西方战后复兴计划的推行，看到我国当时旧政权下“不惟计划全无，且人才尤为缺少”，而中国特殊的“社会经济环境变动剧烈”，“有中国独有之问题”，未来“工作艰巨，信徙英苏”。“今后数十年所需人才，当以万计”，为了“毋临渴而掘井”，故“建议各大学宜早日添设建筑课程，而今后数十年间，全国人民居室及都市之改进，生活水准之提高，实有待于此辈人才之养成也”。40余年后的今天，看到城乡建设事业的急速发展之际，全国包括清华建筑系的虽然都在茁壮成长，然而建筑人才仍然不敷需要，极度缺乏，建筑教育急待进一步发展，我们衷心地敬仰这位建筑教育家之远见。

——梁思成的建筑教育观基于他的建筑人文观

梁先生多年为呼吁阐明建筑学之特殊性而不遗余力。早在40多年前他就说：“然而我国社会，虽所谓知识阶级，对于居室之重要性且素乏认识，甚至不知建筑与土木之别者。殊不知建筑与土木工程虽均以相类似之物料为其工作之Medium，但其所解决问题之本身，则相去甚远。建筑所解决者为居住者生活方式所发生之问题……皆需要不同之建筑布置以适应各个不同之用处，而土木工程所解决者，则较为间接……。”这里梁先生无意对建筑或土木的任何一方有所轩轻，实际上是由于建筑的人文方面的本质和特殊性，尚不能为一般人所理解而不得不加以大声疾呼。

正由于以上基本出发点，梁先生把建筑归纳为“包罗万象的综合性的科学艺术”。梁先生在建筑教育方面，提倡在内容方面涉及“建筑、建筑工程、都市计划、庭园、户内装饰等”，在组织上有必要“设立建筑学院”。

事实上梁先生不断在推进和实践他的教育思想。早在1948年，即游美归来后，“深感近年欧美建筑界对于都市计划之特别重视，实以建立有组织有秩序之新都市以建立人类健全之体形环境为近代文化中之重要需求，尤足为我国战后建设之借鉴，爰按时代之实际需要，将本校（指清华）建筑系高级课程分为建筑学与市镇计划学两组，并将建筑工程学系改为‘营建学系’。”

在解放后清华营建学系随时代之要求，除“建筑”与“市镇”组外，更设有“园林组”、“工艺美术组”等。此外，并与社会系哲学组联合筹办清华“文物馆”，由梁思成先生兼任馆长，经过积极的筹备，在短短几年，已具备相当规模。可惜这些努力，由于1952年院系调整等之冲击，许多设想和措施，未能继续得到发展。

为适应国计民生与社会发展需要，建筑学教育需要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当然今天的建筑教育，就整体而言，早已极大地超过梁先生当年的设想和实践，但研究梁先生早在清华建筑系的草创时代，即高瞻远瞩，种种独特的教育思想，细审今日我们的工作的不足之处，读之仍倍感亲切，并且尚有实际意义。

——“理工与人文”的结合，“博”而“精”的修养与训练

远在解放前的1947年，梁先生在清华曾经作了《理工与人文》之著名讲演，他爱引美国某学者针对西方物质文明之高度发展而人文教育的缺乏，以致造成西方社会之畸形发展而做之反省，批评西方社会为“半个人的世界”；梁思成先生介绍了这一论点后，针对当时之现实，呼吁中国教育“理工与人文”结合之重要性。此后不久，他就酝酿规划清华“营建学系”，“对于市镇组要安排市政学、土地问题、人口问题等社会学科则为其不可少之课程”。在他晚年《拙匠随笔》（见《梁思成文集》[四]，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5年版）中，对建筑作了他最后的概括，称“建筑C（社会科学U技术科学U美术）”，可以说思想一脉相承，不断发展。在当时还没有交叉学科和多学科渗透等这些名词，但其本质，在梁先生的思想中是明确的。

梁先生在建筑教育方面，还再三强调“博”与“精”的重要性。正由于建筑学的综合性，他要求建筑学生既要有宏观方面即建筑外围的多方面的修养（例如“规划设计人员对城市的生产和生活——经济和社会情况有深入的知识”，“建筑工程与艺术的双重性，又要求设计人员具有深入的工程结构知识和高度的艺术修养”，“为此要加强个人的文化修养”），又要有严格的精深的训练。梁先生自己是“科班”出身，他是极其重视建筑技术运用与艺术手法的推敲的（在理论方面见1961年他在南宁的讲演《从小处着手》，对此作了发挥；在实践方面，他

对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细部处理,以及对学生设计的批改等均体现出这一观点)。梁思成先生的学术造诣是通晓古今,贯穿中西,理工与人文,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建筑教育当然还是要“不拘一格降人才”,从梁先生的言教身教,希望我们的青年学者在治学方法上要基础扎实、脚踏实地、知识广阔、力戒浮华,这是非常重要的。

梁先生晚年更加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哲学,注意方法论方面的探讨,这些都有助于梁先生理论水平的提高,此处就不多述了。

评论历史人物,在剖析他的贡献时,重要的是看他处于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推进了些什么?他的理论和实践,除在当时的历史作用以外,若干年后,重温旧作,是否仍有新意,富有教益?以此点来看梁先生,我们更感到作为一个大师与先驱者的伟大之处。

梁思成先生能远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前,以炽热的爱国主义激情,憧憬着未来,力戒保守,呼唤发展近代新建筑学,预见到祖国对建筑师的需要数以万计,更致力于建筑教育。今天我们在社会经济的急遽发展,全国城乡处于所谓“城市起飞”(urban flight)新的历史时代,中国的建筑师如何更好地为世界上1/5的人口服务,提高城乡人民生活,建设好新的聚居环境,如何发展“新而中”的建筑文化,如何使中国建筑学术在“百家争

鸣,百花齐放”的新形势下,发展新的中国建筑学派,以立足于世界建筑文化之林,中国的建筑教育如何在几十年发展原有的基础上,有着眼于现实需要的同时,使青年英苗茁壮成长,迎接21世纪的到来,并为2050年,即新中国建国100年后富强昌盛的前景莫立基础,这正是我们应当深谋远虑,并为之努力以赴的,这也是我们今天纪念梁思成先生85诞辰的真正意义之所在。

1986年10月24日

编者附注:本文为吴良镛先生在纪念梁思成教授85周年诞辰纪念会上的讲话,此次发表时为照顾到本论文集的整体结构,将原稿第一、二段删去,现将此二段转录于此:

梁思成教授在“文革”凄风苦雨的折磨下,离开了我们,至今已14年了。今年是梁先生诞辰85周年,也适逢他创办清华建筑系40周年。在这个时刻,我们来隆重纪念梁思成教授,意义是重大的。

10年前,当沉霾消散,雨过天晴的时候,我们就立即着手进行梁思成学术著作的整理出版工作。现在这个工作已基本告一段落(还有一些佚文补遗以及《营造法式》二卷的注释,有待较长时间的后续研究)。为了纪念梁先生85诞辰,我们还在短促的时间内,邀请他的同辈友好和他的学生写了一些纪念文章,各从不同的角度,回忆和缅怀梁先生的生平、为人、治学、品德和贡献。这就是今天呈现在大家面前的《纪念文集》。

(本文原载《建筑史论文集》第十辑,清华大学出版社 1988年)

# 《梁思成文集》序

吴良镛 刘小石

梁思成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家。他对我国的建筑事业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梁先生一生的辛勤劳动，留下了关于建筑的论文、报告和专著等共有 60 余篇。包括：古建筑的调查报告和论文；建筑理论、建筑设计、城市规划的文章和建议；以及有关建筑教育和科普文章等。现在我们将其中有重要学术及史料价值的文章报告 45 篇整理出版。此外，梁先生早在三四十年代就已经着手、并在 60 年代继续撰写的《营造法式注释》一书卷上业已整理完毕，即将另行出版。其它过去已发表过的专著如《清式营造则例》等亦拟陆续再版。

梁先生在大动乱的年代里，离开我们，现在已经 8 年了，梁先生文集的编辑和又停顿了 10 年的《营造法式注释》，是在 1977 年以后才得以继续进行的。作为梁思成先生的学生，追随先生学习和工作多年，我们整理遗篇，重读华章，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引起了无限深切的怀念。

梁思成先生是广东新会人，梁启超先生长子。1901 年出生于日本东京，1915 年至 1928 年就学于清华学堂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哈佛大学研究院。1928 年以后，先后任东北大学、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系主任，“中国营造学社”法式部主任。解放后，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一、二、三届人大代表，三届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

梁思成先生是我国建筑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为我国建筑教育先后创办了两个建筑系。1928 年当他从欧美游学归来，任东北大学建筑系系主任，先后聘请陈植、童寓先生以及已故的蔡方荫、林徽因先生任教。这个学校在“九一八”

事变时被迫停办。抗日战争一结束，梁先生又以兴奋的心情筹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梁先生是一位优秀的教师，当年自己亲自担任过多门讲课。他对青年的热情关怀，他的渊博的知识，对专业的真挚感情，身教言教，对于鼓励青年热爱专业，树立良好的学风和为祖国的建筑事业的献身精神具有极大的感染力。早年东北大学的学生如今都已成为有造诣的老专家，而他后期的学生，多已在祖国各地成为骨干力量，“桃李满天下”这个成语，对梁先生说来是毫不过誉的。

梁先生早年在美国学建筑时，见到当时大量文物流落异土，伟大丰富的祖国建筑遗产国外了解无几，国内研究者寥寥。面对这种文化落后的状况，梁思成先生以激昂的爱国热情，把一生主要精力从事古建筑遗产的研究和整理工作。

梁先生对古建筑的研究，从建筑实物调查入手，用他自己的话说，先以曾在清宫营造过的老工匠为老师，以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为课本，以北京故宫为标本，以“大木作”为中国建筑结构的基本“文法”，先把清代建筑营造方法及其则例弄通；在此基础上，由近及远，将宋《营造法式》与清著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这两部“文法课本”互相比较，“以今证古，承古启今”，并实测宋辽金实物，互相印证。从而将晦涩难解的中国古代重要建筑巨著弄懂弄通，进一步加以整理，用近代建筑表现方法图解注释，为研究宋以前古代建筑打下基础。他说：“近代学者治学之道，首重证据，以实物为理论之后盾。俗谚所谓百闻不如一见，适合科学方法。艺术之鉴赏就造型美术言，尤须重‘见’。读跋千篇不如得见原画一瞥。秉斯旨以研究建筑，始庶几得其门庭。”这种收集大量事实，重视实验，比较研究的方法是科学的，具有创造性的。梁先生

在当时营造学社社长朱启铃先生领导下和文献部主任刘敦桢先生分工合作，披荆斩棘，率领学社其他同人，足踏16省、200余县，涉猎建筑文物、城乡民居及传统城市计划等2千余单位，为我国古建筑的研究开创了自己的道路。中国建筑史上的一些重要遗构如佛光寺、独乐寺、赵州桥、应县木塔等都是当时发现鉴别和测绘的。今天有些文物建筑虽已荡然，而图样史料得以幸存，一些世代相传的建筑经验得到了记录，对中国建筑的历史发展从混沌中初步得到整理，中国建筑的古籍巨著得到释注。中国建筑的基本特征，中国古建筑以及城市规划、民居、园林、雕塑、装饰等方面所达到的辉煌成就得到总结和阐述，使中国古代建筑这一瑰宝，拂去尘埃，重放异彩于世界文化之林。梁、刘等先生开创之功，不可磨灭。“薪尽火传”，今天战斗在祖国古建战线的骨干就是他们培养出来的一支队伍。1946年梁先生应聘到美国耶鲁大学讲授中国建筑，并由普林斯顿大学赠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1948年被选为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院士。这都表明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承认和赞扬。

作为一个建筑史家，他很自然地关心古建筑的保存工作。远在抗战以前梁先生就作过曲阜孔庙、赵州大石桥、正定隆兴寺大佛阁修理计划等。有的图已画好，惜未能实现。抗日战争结束以前他曾经编写过全国各地古文物建筑目录。还曾托人转送一份给当时正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志。无论在解放前后他对北京旧城以及其他各地文物保护的宣传更不遗余力；梁思成先生对古建筑的维护工作，也有其独到的见解。例如“整旧如旧”这一类梁先生特有的风趣的词汇，被沿用下来，成为古建筑维修工作的一条原则。

梁思成先生勇于接受新生事物。比较早地就思考建筑理论、设计创作以及城市规划等方面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濒临结束，梁先生注意到当时西方建筑界热烈讨论关于战后城市改造和居住环境问题。1947年赴美讲学归来，他曾发表“住者有其房”，重视“体形环境”的倡议，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虽属空想，但也是一种不满时弊的呐喊。这时梁先生转向社会，从考察历史进而面向现实。从古建筑扩至城市环境，不断追求新知，这是进步，是值得肯定的。尽管他对共产主义并不了解，1948年在等待着祖国解放的时期，却浏览着有关城市理论书籍在

期待着明天！北京解放了。他从党和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中，看到中国人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一个统一、团结、富强的新中国就在眼前。为了认识这新社会是怎样来的，应当如何去建设它，他努力地学习马列著作。他高兴地认识到过去以为建筑师们开出的可以医治现代城市疾病的妙方良药，不少地方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局限，乃是难于实现的空想。而新中国却提供了使它变为现实的美好前景。作为一个爱国知识分子，他以满腔热忱，投入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担任了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等工作。

对北京的城市规划，梁先生做了不少工作，提出过方案和许多建议。他曾提出北京应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建议建设新的行政中心；保存北京故都的面貌，保存古建筑城墙城楼；限制旧城内新建建筑高度不得超过三层；以及限制城区工业的发展等许多意见，并为之写文章、作报告、奔走呼号，尽了一个建筑工作者应尽的职守。他在50年代发表的《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等文章，多是为之作。

在建国初期，全国都在贯彻执行“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号召。梁先生当时能结合北京应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这一特点，提出重视环境保护、防止工业污染、保护文化名城的面貌等意见，现在看来，实在可以说是难能可贵了。

对于北京旧城的改造他并不是主张一切都保留原状。用他的话说就是：“不是连‘泰山石敢当’那块界石都不准动”，而是为适应新的需要进行改造，而又力求保存有价值、有意义的历史面貌，不要弄得面目全非，破坏其珍贵的历史价值。巍峨壮丽、气势雄伟的北京城墙城楼，是古城特有的标志，它与城内的紫禁城、钟鼓楼遥相呼应，形成北京美丽独特的天际线，是北京城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上封建时代名都大邑中，也是唯一得以完整保留下来的。他坚决反对拆除城墙城楼，并作了改造利用的方案。通过各种方式陈述他的意见，为此作了很大努力。梁先生多次反对为使马路取直、方便交通而把北海团城和金鳌玉蝀桥拆掉另建新桥的改建方案，他的这个意见最后得到周总理采纳。现在保留了团城，展览了原有的石桥和马路，达到了既便利交通，又保存了原有环境面貌的良好效果。

建筑设计和创作不是梁先生一生建筑活动中的主要部分，但他对设计创作道路问题，一向重视，不断思考。他从事中国建筑的研究，还希望作到有助于设计创作，达到“为中国创造新建筑”这一目的。早在1935年他所主编、刘致平先生编著的《建筑设计参考图集》序中就发表了这一见解<sup>[1]</sup>，当然这些见解不可避免受那个时代的建筑思潮如折衷主义和国际现代建筑流派等多种影响的局限。后来思想的发展也各有其时代背景。但梁先生五六十年前所提出的“为中国创造新建筑”这一命题，至今仍然是有待研究的问题，至于探索过程中所经历的曲折的道路，就不能苛求于古人了。

梁思成先生热爱党，热爱党的事业，他对党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在解放以前他不过问政治，对党也是不了解的。1948年12月清华园解放了，正当梁先生和同志们欢欣鼓舞奔走相告的时候，解放军的干部来到梁先生家里，要求他帮助编制北京古建筑地图，以备攻城时给以保护避免遭受破坏。惊讶和兴奋之余，作为一个对共产党不了解的学者，震动是很大的。从此开始了他对新社会学习、认识，到最终致力于终身为之服务的新的历程。这种对党的感情也表现在他对老一辈革命家崇敬和热爱上。他积极地从事党所交给他的各项工作，梁先生是一位学者，但他却以自己热爱祖国，热爱党的一片热忱，积极地发挥先锋作用。在全国解放初期，当一些知识分子由于对革命形势不了解，尚在观望时，在梁先生的影响和努力下，团结邀罗了不少人才，为新中国的建设而工作。当年和梁先生共事的一些老同志们，对此记忆犹新。梁先生对于他的主张是能坚持的，同时也是能虚心接受意见的。在1955年对建筑界的错误倾向提出批评后，他虚心自省，对大屋顶所造成的浪费深感惋惜，但在一些学术问题上又迷忽彷徨。还是在1962年广州会议上，在周总理、陈毅同志鼓励启示下，梁先生振奋精神，“先把旧有的工作拣起来”，重新继续了搁置了多年的宋《营造法式》研究工作。也就在这一时期作了《真武阁——一个杠杆结构》的调查报告，并兴起了整理论文集的念头……可惜因为狂风恶浪的动乱，夺去了他的时间，否则他还可以作更多的工作。但即使如此，他在艰难的生活条件下，在重病之中，仍孤寂地对一些文章进行过删削工作。

梁先生献身于建筑事业的精神，也是很令人感动的，为了进行建筑的调查研究，长途跋涉，爬高就低，不辞劳苦。在一次测绘中，为了登上塔顶拍照，手把铁索，两脚悬空地攀上，那时天气已近寒冷，而铁索更是凛冽刺骨，助手们望而犹豫，而梁先生却身先士卒。去佛光寺测绘，报告中云：“摄影之中蝙蝠见光振翼惊风，秽气难耐，工作至苦，同人等晨昏攀跻，或佝偻入顶内，与蝙蝠壁虱为伍，或登殿中构梁，俯仰细量，探索唯恐不周……”。在旧社会出于名门世家而能作到如此不辞劳苦是不容易的。而每有发现，“则又惊诧，如获至宝”，只有寄怀于学术的人，才能达到如此忘我境界。在他40岁左右，因患脊椎软骨硬化病，忍受着中枢神经受压的剧痛，不得不改在内业工作。他曾经身穿铁马甲，下巴依在一个花瓶上，伏案作图，为的是利用花瓶这一支点，承受头部的重量，减轻脊背的重负，画图时不断调节花瓶的位置，其艰难可以想象。《塔的分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拟出的初稿，由助手完成的。也就是在这同一个夏天，因患牙病，需把牙齿全部拔光，每拔完一次牙，要痛一两天，而《市镇的体系与秩序》这篇文章，就是依在床上读完老萨里宁（E. Saarinen）《论城市》这本书后有感而发的。解放以后他更积极地参加许多重大的工作，如国徽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方案设计等。工作完成或行将结束，随之而来的常常是大病一场。他和林徽因先生一样，疾病影响他的工作，但从未使他们终止工作。

梁先生是很爱护人才的，曾有某同志向梁先生介绍一位美术老师高庄教授，事先说明“这位先生是有水平的，但性情耿直，有脾气”。梁先生说：“只要他有本领，我让他三分。”梁先生果然寄以极大的尊敬，传为佳话。在国徽设计中，这位老师作出了很好的贡献。

回顾梁先生的建筑活动和贡献，自然地会想起了林徽因先生，她是梁先生在美国的同学，早年学习美术与舞台设计，后专攻建筑，成了梁先生建筑活动的密切合作者，《清式营造则例》序言就是由她撰写的。她才华横溢，思想奔放，她以特有的对新事物的敏感，除了研究建筑历史之外，很早就注意国内外住宅问题，并对工艺美术、园林设计、室内设计与建筑装饰等广泛涉猎，有独到的见解。解放后，她不顾多年病魔缠身，积极地投入各项工作，为清华学生开讲座。清华大

学在解放初期,对特种工艺美术,如景泰蓝的新设计图案的试验,也是在她的积极推动下进行的,为受多年战乱摧残近乎奄奄一息的传统工艺美术的振兴作了工作。她并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装饰文样设计等,作了不少探索。和梁先生一样,她对青年学生的热情培养,也是令人十分感动的。每有学生来访,总以振奋的心情尽情地为学讲解,古往今来,对比中外,谑语雄谈,敏思遐想,使初学者思想顿感开扩。学生走后,常气力不支,卧床喘息而不能吐一言。这样一位尽瘁于建筑事业的人过早地结束了她的生命,

是非常可惜的。这一部文集其中有她的辛勤劳动,是对梁先生的纪念,也是对她的纪念。

1980年12月

#### 注释:

[1]“我们希望他们认清目标,共同努力为中国创造新建筑,不宜再走外国人模仿中国式样的路,应该认真地研究了解中国建筑的构架、组织及各部做法权衡等,始不至落抄袭外表皮毛之讥。”见《建筑设计参考图集序》。

(本文原载《梁思成文集》[一])

# 不能忘却的纪念

周干峙

梁思成先生是我国卓有成就、充满爱国热情的建筑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在开拓新中国的建筑事业的道路上是重要的先驱者和奠基者。纪念他就是要发扬光大他的正确思想和学术观点，使之更多、更好地为现实生活服务。

梁先生早年在我国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条件下，在深厚的中国文化基础上吸取了先进的西方文化；在接受现代西方建筑教育后研究了中国传统建筑；在传统建筑学的基础上发展了宽广深厚的建筑学思想，难能可贵地为国家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

解放以前，梁先生表面上不问政治，潜心于建筑教育和古建筑研究。但是，他的这一切，都建立在一个明确的政治思想基础上，就是不甘心国家落后、民族贫困，矢志奋发图强、振兴中华。在三四十年代他都有机会留在美国执教，但他不肯留下来；解放前夕，有人动员他迁往台湾，他又坚持不走，为的就是放不下自己的祖国和心爱的事业。以至解放后，有一段时间受到不公正的批判，身处逆境，但他从不动摇对国家对党的炽热之情，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梁先生的这一切都说明了他在学生时代就已经认识的“作为社会的人，是离不开政治的。”离开了爱国主义这一政治思想基础，就不能理解梁先生的为人，他的卓越成就和进步的学术思想。

梁先生对中国建筑科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学术上，他最主要的贡献是开拓了一条融贯古今中外，内涵广阔的建筑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他把建筑上延至城市和区域，下伸到室内设计、日用工艺设计，凡构成影响人的物质的、精神的环境要素，综合集成为为人的生活创造一个有体有形的“体形环境”的建筑观。

作为一个建筑师，梁先生早就对本

专业有精辟见解，他突破传统观念，要求建筑师要有一定的社会经济知识、科学文化素养和道德品质。他的建筑学思想是不断发展、日趋广阔的。他很早就提出城镇体系的设想，探讨中国城镇的模式问题，又关注微观的工艺设计问题，他曾为改进景泰蓝设计而努力，在火车上发现小桌子上不宜用圆形碗碟而建议设计方形的餐具。“体形环境”的思想和国际上后来创导的“环境科学”、“环境设计”是同样的思路，是我国后来自己发展的“广义建筑学”、“城市科学”的先导和基础。梁先生这一思想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建筑学人，在我国的建设事业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当代一些科学家曾提出科学和艺术同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属于人的思维和认知，两者同一根源；所以，企求科学与艺术的结合，两者互相启发，互相促进。其实梁先生的学术思想就是科学思维和艺术认知的统一。因而，常常具有丰富的创造力和精辟的预见。在城市规划方面，梁先生就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和科学预见，做了许多开拓性工作：

1. 引入国外现代城市规划思想。远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前，梁先生就致力于城市规划问题的研究。1945年10月在《大公报》发表《市镇的体系秩序》一文，指出市镇“是一个机构，必须有组织有秩序方能运用收效，”“使居民安居乐业”。解放后，组织翻译了国际建筑师联盟(CIAM)的《城市计划大纲》(雅典宪章)研究了“大伦敦规划”，并和林徽因先生合译了《苏联卫国战争被毁地区之重建》。1947年从参与联合国大厦设计回国后就向学生介绍美国城市中的贫民窟问题以及交通问题等等，为我国城市规划工作进行教学准备。

2. 率先组织城市规划专业教学。40

年代,梁先生在四川李庄工作时期,就希望“今后各大学增设建筑系与市镇规划系,实在是改进兼辅导形成今后市镇体系秩序之基本步骤”。在清华成立建筑系后,1948年即举办“市镇组”,开设“市镇概论”课程,由校外教授、学者讲授专题讲座,包括请侯仁之先生讲北京的城市历史,陈占祥先生讲城镇规划基础,汪菊渊先生讲城市绿化,曹言行先生讲北京的市政工程等等,并按照他自己的“建筑观”提出体形环境设计的教学体系,可说是国内最早的城市规划设计专业的雏型。

3. 预见到新中国城市发展将会遇到一些问题。住宅问题和城市规划问题是梁先生早就注意的两个问题。清华建系之初,他就向学生讲新中国不仅要“耕者有其田”,还要“住者有其房”,“睡者有其床”。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早就和林徽因先生分工合作研究“住宅问题”和“城市规划问题”,已经预见到战后将有几百个新城镇出现,“为达到使人民安居乐业,我们要致力于城镇体系之建立,以为建立社会秩序的背景。为达到市镇体系秩序之建立,我们要每一个县城市镇都应有计划(注:即规划,英译相同)的机关,先从事于社会经济之调查研究,然后设计,并规定……,每五年或十年将计划加以修正。凡市镇一切建设必须依照计划(同规划)进行。为达到此目的各地方政府必须立法,预见市镇扩充而扩大其行政权;控制地价;登记土地之转让;保护‘绿荫地带’之不受侵害;控制设计样式”。当时所想到的这些和今天所碰到的情况,竟是如此的相近。

4. 预见到中国古建筑的巨大文化价值,现代化建设和保护文物建筑的矛盾。梁先生很早就担心中国建筑将会随着大规模建设而覆灭。提醒人们不能忽视中国城市的传统风格的发展,要避免走那种“国际风格”的单调、冷酷、千篇一律的现代建筑的形式。梁先生从国外的教训中,早就为文物建筑景观往往受建设性破坏而提出警告,主张要着重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和保护文物建筑环境,不遗余力地做了大量保护、抢救文物古建的工作。

5. 主张保持城市要有民族特色的思想,仍然是梁先生的正确思想。他的民族形式的观点,建立在强烈的民族自信心之上。梁先生在1937年就在美国举办的中国建筑展览会上宣告:“中国的建筑是

世界上历史最长,生命最久,散布区域最广的一系建筑。欧洲的建筑,在各个区域里随着他们各期各地的民族文化兴盛衰亡,而中国建筑却有史以来是永久赓续的。虽然中华民族在思想上受过外来宗教的影响,在政治上受过异族统治,但中华民族却仍保持其数千年的特征,自成一个伟大的民族。以整个的中国建筑讲,它所反映的正是这个民族的伟大的性格。”他在讲课中,常常用佛塔传入中国后被中国建筑传统吸收消化由窣堵波(stupa)演化为楼阁式塔的历史,说明他主张兼容并蓄,消化吸收一切中国的、外国的对新的建设有用的文明,而不主张简单化的抄袭搬用。由于梁先生过分偏爱中国的古建筑,在50年代初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曾一度要求传统形式过多,民族形式问题就偏向到仿古、复古方面。但他的城市要有民族特色的思想是无可非议的。

6. 为北京这样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的规划作出了贡献。梁先生最早以整体的眼光正确地评价北京古城的价值;很早他就对北京的总体规划提出了整体的设想;他还为北京很多重点地区做了规划设计。他的意见虽然没有完全付诸实施,但是他的很多论述和见解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影响了一代人。

历史证明了梁先生在城市规划方面的许多预见和设想是具有科学根据的,至今看来还是正确的。突出的有:关于建立城镇体系的设想;关于住宅问题是城市建设主体的观点;应当确立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加以保护的意見;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议必须处理好旧城区改善和新区建设的关係;对历史性建筑的保护既要保护其本身,修旧如旧,又要保护其环境;以及对首都城市规划的许多原则性意见,如北京不宜发展工业,要保护好城墙,以及保护旧区发展新区,城市规模不宜过大,要限制旧城新建筑的高度,等等,都是切合我国实际,也是正确可行的。实现这些正确观点和意见,对我国城市的健康、文明和持续发展,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和巨大的价值。

解放以后,梁先生在新中国生活工作了22年(1949~1972年),1949~1955年是他工作的黄金时期;1956~1957年就受到“复古主义”批判;1958~1964年可以说是反反复复,难以发挥作用的时期;1965~1972年则处于被批挨斗的苦难阶段。总起来,真正发挥作用的时间最

多一半左右，特别是最后带着困惑和痛苦去世，不能不说是一场悲剧。回想梁先生在1955年接受批判后，曾撰文《永远一步也不再离开我们的党》，希望“至少还可以工作25年，争取至少工作到我80岁的那天”。如果这一愿望实现，在我国历史的新的一页中，他的正确主张将对改革、开放，对国家建设事业起多大的作用啊！梁先生一生的际遇应该讲既有大作为，也受大折腾，这种现象不仅是梁先生一个人的问题，是历史、是时代的产物，梁先生是这一历史时代中国杰出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家的一个缩影。他们的不幸是国家和社会的巨大损失。回忆我国第一代建筑科学家梁思成先生和他的建筑事业，我认为“过去的事情”不能“就让它过去”，我们应当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使国家、社会进步更快，使人民更多受利。

怎样才能更好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呢？看来要用历史的观点、前瞻的观点，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去提高认识，譬如：

首先，国家社会必须对科学家采取保护的政策。科学家是社会精英，特别像梁先生那样炽热爱国的学者，解放前就被喻为国宝，对比钱学森在美国，当时美军方曾喻之相当几个师的军力，梁先生在建设战线上也不下于一个军的作用。“三军易得，一将难求”，这是在国家角度上的古训。应该看到，科学家对科学的某些认识也会犯错误，应该允许其从实践中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而不要随便对他的错误扣上政治帽子，50年代初梁先生对建筑风格问题的看法并不是全面的，但基本上是一个学术问题，批评他“复古主义”，现在看来失之偏颇。在90年代的今天，大屋顶、假古董已多到梁先生都不会赞成的程度，又何从谈其政治倾向。学术问题，只能通过学术讨论和科学实验来解决。

其次，科学家自身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要有不被理解的思想准备。科学是

探求规律的事业，科学家是探求规律的先行者，他认识规律，往往比常人要早一点。而一个正确的观点，在开始时往往暂时地处于少数，因而处于孤立甚至被误解的地位。科学家的悲剧，不仅在科学不发达的哥白尼的时代存在；在科学比较发达，甚至相当发达的时代，只要人们的认识有差距，就会有矛盾。这种悲剧就会程度不同地出现。作为科学家本人，应当认识到这也是一种规律，当然不是必然规律，因为认识是可以通过实践检验，取得共识的。但总要有被误解，当少数的思想准备，能处顺境，也能处逆境，在逆境中也还要相信真理，坚持真理，必要时要有牺牲精神，甘当受压的铺路石，为科学事业贡献一切。梁先生那样的先驱者，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再次，科学家之间，专家、学者之间要互爱互容，要允许有不同的看法，能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坚持的只有真理而没有任何其他东西。专家们的相互支持，互容互济，以至师生之间的理解，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小环境，对专业发展、领导决策和本人工作是相当重要的。

当前世界科技发展的特点，一是异常迅速，二是集体行为越来越突出。和历史有所不同，“天时”、“地利”固然重要，更为重要的是“人和”，也就是更需要有一个有利于科学家研究发展的社会环境。而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总结了历史经验，已经把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进而把“科教兴国”作为国策，正面临着一个科技、教育大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显然造就一个爱护人才、尊重人才有利于科技发展的社会环境是至为关键和十分迫切的问题。梁先生等上一代专家、学者，在环境条件还比较差的情况下，尚且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环境条件改善以后，再加上方方面面齐心协力，上上下下群策群力，中国的知识分子、科学教育工作者定能继承先贤的好传统，不忘过去的艰难，发挥无穷潜力，做出无愧于国家民族的更大的成绩来。

# 一代宗师 垂范后学

——学习梁思成先生文集四卷的体会

傅熹年

我们敬爱的老师梁思成先生的学术论文集四卷，经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精心编辑，又聘请十余位专家校阅注释，历时六年，已于1986年全部出版问世。梁先生是中国现代建筑教育的最早创办人之一、中国建筑史研究和城市规划工作的奠基者，《梁思成文集》收录了他的主要学术论文，除了建筑教育理论和教育思想尚付阙如外，全面反映了他在中国建筑史研究和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上的主要成就。

尽管文集中的主要论文完成于30年代至50年代初，距今已有40至60年之久，但在今天看来，仍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这是因为他的一系列建筑史论文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精神和系统的科学研究方法，揭示了中国古代建筑的设计规律、技术特点，总结出中国建筑的主要特征和成就，使中国建筑史的研究从蒙昧走向科学，形成一门独立学科；同时，他在古建筑的保护和城市规划、特别是北京市的规划和旧城保护上的意见已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表现出他的远见卓识。

本世纪以来，最先对中国传统建筑感兴趣的是一些外国学者。庚子以来，日本人对北京宫殿和各地著名建筑做过一些调查研究，取得一定成果，瑞典学者也做过一些工作。20年代末中国营造学社成立之初，只吸收到少数文士和匠师参加，尚未能在现代建筑学和美术史学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因此，日本人关野贞等曾向中国营造学社社长朱启钤先生建议进行合作，日方负责调查、测绘、研究实例，中方配合文献考证。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梁思成先生和刘敦桢先生毅然加入营造学社。由于他们卓越的学术水平和辛勤的工作，很快使国内的中国建筑史研究有了一个飞跃的发展。梁先生采取

由近及远、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首先以清《工部工程做法》为课本，以老工匠为师，以北京故宫和一些重要的明清官式建筑为标本，刻苦钻研，很快就掌握了清官式建筑的设计规律，其成果表现为《清式营造则例》一书。稍后，他又以更大的毅力钻研宋式建筑。他以艰涩难懂的宋《营造法式》为课本，实测若干宋、辽、金、元建筑，取得精确测图和数据，再与宋《营造法式》相印证，终于基本理清了宋式建筑以材分为模数的设计方法和其中所体现的科学成就。本文集卷一所收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反映了他通过精密测绘并与《法式》印证初步探明宋式建筑设计规律的过程和科学的研究方法，是这方面开天辟地的第一篇重要论文。这篇处女作不仅一举超过了当时欧美和日本人研究中国建筑的水平，而且就透过形式深入探讨古代建筑设计规律而言，也超过了日本人当时对日本建筑研究的深度。此后，日本人就不再提由他们代劳测绘研究中国古建筑实例的事了。四年以后，梁先生又发现了五台山佛光寺唐代大殿，这也是经日本人屡次调查，印在书本上却不识其为唐代遗构的重要古建筑，使日本人惊赞之余，颇难以自解。梁先生在强烈的爱国热忱激励下，以勇锐直前的钻研精神、科学的研究方法，在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为中国在这一学术领域争了气。

从《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到《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通过一系列的对古建遗物的调查研究，梁先生把这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发展得更为完备、严密，不仅科学地逐个分析了每座建筑的特点、成就，而且通过比较，掌握各时代的共性和不同时代的差异。正是在这基础上，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条件下，梁先

生进行了建筑通史和《营造法式》的专门研究,最后形成他另二部专著——《中国建筑史》和《营造法式注释》。《中国建筑史》还反映了梁先生的史才和在文献考证上的深厚功力及精审的选择取舍,迄今仍以其选例精当、徵引文献浩博、文字精练而独树一帜。

梁思成先生还把美术史研究中惯用的比较分析法应用于中国古代建筑研究中,为鉴定古建筑的年代建立了科学的“方法程序”。他这方面的代表作是《平郊建筑杂录四·天宁寺塔建筑年代之鉴别问题》。他指出当建筑的实际情况与文献明显不符时,应从对总体轮廓和装饰细部的分析来鉴定年代,应以若干有准确年代的实物为标准,归纳出各时代的不同风气,与要鉴定的建筑进行比较。在文中,他旁征博引,以塔的平面、立面在不同时代的特点和演变趋势证明天宁寺塔是辽建而非隋建,又以辽至明各代塔的细部与此塔相比,证明其经明、清大修。这篇文章表面是讲天宁寺塔,实际是以此为例,阐明鉴别古建筑年代的方法,故他在文中也说这篇文章“聊作我们对于鉴别建筑年代方法程序的意见,以供同好者的参考。”这是一篇讲鉴定和研究方法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论文,是奠定建筑历史研究方法论的重要著作。

通过精密测绘,充分而准确地掌握建筑物的资料数据,进而探索其建筑、结构设计规律;通过对有确切纪年的实例综合归纳出各时期建筑在整体及细部上的时代风气和发展趋势,掌握正确地鉴别年代的方法,这二点是使建筑史研究具有科学性所不可少的,也可说是建筑史工作者的重要基本功。这方面梁先生为我们做出了杰出的示范。近30年来,建筑史研究者发表的论文专著数量大增,其广度远远超过前人,但如能像梁先生那样,把工作建立在精密测绘、充分掌握资料数据以深入探讨其内在规律上,所得成就可能还会大得多。因此,汇集发表梁先生在这方面的作品,对于推动建筑史研究的发展,提高其科学性、可信性,避免片面性、随意性来说,仍有极重要的现实意义。

梁思成先生在古建筑保护上的杰出贡献主要表现在文集所收《杭州六和塔复原状计划》、《曲阜孔庙之建筑及其修葺计划》和《闲话文物建筑的重修与维护》等论文中。前二篇一重在恢复原状,一重在保持现状,为在不同情况下正确

选择保护维修古建筑的方法作出范例。最后一篇针对赵县安济桥遭到毁灭性的重修,言婉而讽地指出应使经过维修的历史建筑仍保持“饱经风霜”但“老当益壮”的面貌,而不是返老“还童”,并提出维修历史建筑要“整旧如旧”,和修补增建的部分应“有若无、实若虚、大智若愚”的原则。他的这些卓越见解当时未能得到应有的理解和重视,甚至有人认为,如果这样,我们修缮的成绩怎么表现?但经过30年的实践检验,近年已被普遍接受,承认在表面上看不出经过修缮才是修缮文物建筑的最高水平,并成为维修历史建筑的指导方针。随着四化建设和旅游的发展,目前保护维修历史建筑的规模要比“文革”前大许多倍。重新发表他这方面论著,可以使文物建筑的维修工作做得更好,避免一些可以避免的失误,也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

抗日战争胜利后,梁先生看到近年西方国家鉴于城市无计划发展给城市生活造成危害因而对城市规划、生活环境质量开始重视并在学术上也有所发展的事实,联想到我国未来建设的需要,开始研究城市规划问题。1946年,梁先生在清华大学创建了营建系。系名不取通用的“建筑系”而称“营建系”是有深意的。其“营”字出于《周礼·考工记》中的《匠人营国》,即指城市规划。营建系除创设了我国第一个市镇组外,随后又试设了造园组,并组织一些人开始进行装饰陈设的研究,这说明梁先生在建筑学术思想上已突破了单纯建筑房屋的局限,宏观上扩大到城市、园林,微观上深入到室内布置陈设,可以视为现在创造人类居住环境思想之滥觞。解放后,梁先生以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城市规划和旧城的保护改造中,特别是首都北京的规划和保护。他在50年代初就提出北京应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建议建设新的行政中心,保存北京风貌等极有远见的正确主张,呼吁在城市规划中考虑传统特点并在城市规划中统一考虑历史建筑的保存与使用。这些都反映在文集所收《城市规划大纲序》、《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等论文中。虽然他的这些主张都未能实现,而他所预言的一些缺憾也大多不幸而言中,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热爱祖国、热爱党、坚信科学的正直的建筑学家如何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以对人民、对历史、